

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上海通信图书馆

謝 灼 华

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偉大的中国共产党誕生前的二个月，在中国革命搖籃——上海，出現了一个，“旨意在使得无产者有得書看”的上海通信圖書館。它掀开了中国現代进步圖書館事业史的序幕，和前期李大釗、毛澤东同志所主持的北京大学圖書館，在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午台上，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大旗，團結广大革命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坚强斗争力量，它的革命光輝照亮了中国革命圖書館事业。

五四运动前就开始了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知識分子（这里所指的知識分子是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創始人；也包括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和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在內）从封建保守的、反动的旧文化束縛中解放出来。他們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在科学和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探索和学习，大量翻譯西方科学著作，并从事著述、发表文章，使五四运动前思想界、文化界有了一番新的变化。而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新文化，“由于中国政治生力軍即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午台，这个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摆开了自己的陣势，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文化革命就更深入，广泛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了。”（“新民主主义論”毛澤东选集第二卷690頁1952人民）这时，文化战线上两种文化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与資产階級以及封建文化遺孽的斗争极其激烈，社会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通过一切文化事业来宣傳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思想主張，他們办起了大量的報紙、期刊，多种多样的文化机构。書籍、新聞、出版事业空前繁荣起来，自然促进了这时的圖書館事业的发展。圖書館界的斗争反映在一方面，中国早期杰出的馬克思主义者李大釗同志，中国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东同志都从事于圖書館工作，利用圖書館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广大青年，使他們覺悟起来。另外一方面，封建文人梁启超，帝国主义文化代理人胡适之流也紧紧抓住了圖書館——这个“教化民众之場所”，以扩大其反动的文化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中国現代圖書館事业史早期阶段两軍对垒的局面。

上海通信圖書館正是在这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也是党的革命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它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对五四以后新思潮的傳播起了不小的作用，并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培养了不少坚强领导骨干。

我們决沒有妄想去哀求强者的布施，替我們在各地造起圖書館，也決不甘心只期待現社会制度崩坏后的总解决，而在未崩坏之前不去夺回設者的自由；

——上海通信圖書館与讀書自由 1926

一九二一年五月，进步青年，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的应修人同志，團結了上海錢业界的一些職員和学徒，創辦了上海通信圖書館。这个仅由10个人创办起来，只有138种不滿三百冊

藏書的小圖書館，第一次承担了上海市唯一的公共圖書館的任务，开始了它的革命活动。

最初，他們是以“互助团通信圖書館”的名字出現的，他們創辦圖書館的目的，可以从創辦宣言中看出来：“近来改造社会家多肯着眼于出版事业，这原是最可喜慰的事，但于讀者的一方面却很少人顧慮。試問在現代私产制度下的人們，能有充分的讀書期么？能有充足的买書力么？……沒有圖書館以便利羣众，則書報只能流通于有产階級。”这是对那黑暗社会的控制書，对那底层讀者的亲切關懷的表征。因此，他們靠自己买，少数外界的捐贈，抱着“多認識几个有志的讀書者，多添我們几分激动；多貸出几种有益的書報，便多添我們几分快慰。”赤心獻胆为讀者，历尽艰辛的办起了“上海通信圖書館”。他們的希望，一是在于使圖書館“成为运近人們底藏書庫”，一是“为大規模的上海圖書館的先导”。总之，以實現新文化以教育人民大众为目的。

革命工作者为讀者服务的目的是如此高超：“咱們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努力使愛讀書者有得書讀，努力使不十分愛讀書者变成十分愛讀，努力使不愛讀書者变成一分一分愛讀，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咱們义不容辭的，并且这些工作也不是枝节的，也不是与革命絕不生關联的。”

正因为革命者了解了圖書館工作“也不是与革命絕不生關联的”。所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广大下层人民服务，是上海通信圖書館的創辦宗旨，而通过圖書流通，傳播新思想，以新文化思想影响于广大青年，使他們在“有时代思想的各种学朮文艺書報”中、找到真理、找到打碎旧制度、旧社会階級压迫的力量源泉，达到團結民众，一起推翻旧社会的目的，这就是他們創辦圖書館的目的。

因此，上海通信圖書館向亲爱的讀者招手：“我們的讀者！你以及你的家人朋友之間，有买不起好書或者买不遍好書的苦悶者嗎？——請到我們这里来！我們这里排列着各种学朮文艺的好書，完全讓你自由選擇，讓你到处借讀。有过不慣現社会的奴役生活，有受不到一滴人类的愛，因而成为生之詛咒者嗎？你們向这里来！这儿充滿着同情的欢笑，人生的乐趣，这儿的組織是‘艺术化’替代着‘商品化’，这儿的信仰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替代着‘你搶他夺，人死我活’！”

上海通信圖書館在那丑惡的旧世界給讀者得到“难得的樂趣”。

收集并流通有时代思想的各种学朮文艺的書報，使每人……能隨時隨地讀到无数的刊物。

——上海通信圖書共進会章程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澤东：“論人民民主专政”寄社会主义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彙編 第一編 上 97頁 1957 人民）中国先进知識分子，在欢呼和响往十月革命的时候，他們多么迫切需要大量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啊！而上海通信圖書館正是以收集进步圖書为已任，大量收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書籍、報刊，流通馬克思列宁主义書籍、報刊和新文化进步書籍，非常鮮明的反映了无产阶级圖書館的階級特性。

上海通信圖書館館藏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从我們所接触的材料中，關於馬克思学說的进步書籍就有馬克思著“哥达綱領批判”（李春蕃譯）、“列宁 特号”、“共产主义ABC”（新青年社）、“社会主义总論”、“社会主义淺說”、“科学的社会主义”、河上肇著“社会組織与社会革命”（郭沫若譯）、“階級斗争”、“馬克思与唯物史觀”、“唯物史

观”、……，中国革命运动书籍，有“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瞿秋白“二七劳工流血案念”、“五卅烈士事略”（小说月报社），以及进步刊物“新青年”、“响导”、“政治周报”、“中国青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之一，1923）等。上海通信图书馆尤以革命文学、进步文化书籍藏书著称，如鲁迅先生的著作，郭沫若先生的著作，茅盾先生的著作。

不让任何地方的人们读不到任何种类的好书，不让任何种类的好书流通不到任何遥远偏僻的地方，这是我们特用通信借还制的本意。

——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书自由 1926

上海通信图书馆是用通信方法借还图书的，这样不仅上海一地读者能得到借阅图书的机会，就是国内远近各地的读者也可以通过书信得到图书。按照他们的本意，这种方法有二种好处：一是可无论职业、贵贱，只要能够出邮资，便有书看，这种便利读者的办法，无疑的是对二十世纪初图书馆讲求门户森严，读者入馆要诸多麻烦手续，以及使多数读者拒之门外的“铺保”、“保证金”、“押金”等制度的一种有力的对抗和无情的讽刺；另一种好处，即是使很多没有建立图书馆的地区的读者，通过书信借到图书。因此，他们是“以无猜忌的真情接待借书者，不收租费；不设保证，也不希望任何的酬劳，以设身处地的用心为借书者着想，使不受路途限制，不受经济限制，不受职务限制，也不受早晚时间的限制”。

通信图书馆怎样及时的介绍馆藏图书给读者，是工作好坏标准之一，上海通信图书馆最初的办法是把所有图书（包括新书、报刊）随时编成书目，在书目上附印各种规章，读者根据这些规定，选择所需图书，用书信借出。但书目往往几个月才出一期，新书甚至有买了一年后才见于书目的，这对借书者是不十分便利的。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他们创办了“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目的正是想通过月报，报导新书，指导读者阅读，反映读者意见，密切图书馆与读者的关系，以及定期向本馆读者汇报工作。借书者必须先作为“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的定户，才能借阅图书馆图书，实际上也只有作为“月报”的定户，才可以借到图书，因为本市或外地读者，要想借阅图书，只有通过“月报”中刊载的书目，查考其藏书动态，了解其借书规则，才能有目的借到图书。所以“编印月报的最大的意义，是使借书者与图书馆之间有条具体的、息息相通的桥梁”。

如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号的“月报”中●有这样简单明了的书目来推荐图书：

社 132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河上肇著 郭沫若译（挂号）

说 114 热风 鲁迅

读者从书目中就知道，要借河上肇著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必须用挂号函件投寄。而鲁迅的“热风”，只是一般书籍，就可平信投寄了。在书目栏中“停寄”的即是图书馆已借出或提存了的书籍，读者凭此书目报导，一般是不会落空的。其借书方法也很简单，读者先了解借书规定，按借书规章填借书约（借书条）。空白借书约在每月月报中附赠，图书馆接到读者借书约后，把图书办理登记，包装好，并夹赠空白借书约和还书包装纸，寄给读者。所以读者借还图书并不感到麻烦，因为图书馆的同志们已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给了读者。

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法也是独特的，如最初把图书分为二十八类，如“社”（社会科学）、“哲”（哲学）、“伦”（伦理学）、“心”（心理学）、……。这样的类目名称较适合于图书流通和帮助读者了解其内容。而图书分类法的“类”是适应藏书需要、科学发展而经常

增減的。1926年8月又采用了新的圖書分類法。这里，我們就可看到圖書館的革命者們如何講求為讀者方便，大胆創造。

上海通信圖書館，通过“月報”，进行了很多推荐圖書，輔導閱讀的工作。如“月報”中有“新書報告”、“新書介紹”、“最近之出版界”、“本月份新書目”、“新書摘要”等栏，这些都是推荐新書的圖書宣傳工作。如1928年9月就曾經刊載潘梓年“苏俄新教育”、蔣光慈“俄罗斯文学”等書的內容摘要。为了推动讀者学习，圖書館还发起过“愛讀書籍”运动，主要是“研究現代社会心理和增加讀者的兴趣所見”，叫讀者以推荐書籍的形式，寄給圖書館，圖書館也可借此了解讀者的需要，滿足讀者的要求。

蓬勃的發展与巨大的影响，它正如一把火炬，照亮了青年前進的道路。

上海通信圖書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圖書館有黨員負責工作，也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組織）以广大革命青年作为羣众基础，展开了和敌人的各种斗争活动，虽然它是处于那样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但它有无限的生命力，任何反动派都很难扑灭这火种，而它的发展和影响更是超过任何反动的圖書館。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过，在1921年5月，上海通信圖書館成立时，只不过10个委員，圖書也只有158种281本。那时，这小小的圖書館，在社会上的名气是微乎其微的，但正如任何革命事业一样，都由萌芽而壮大，上海通信圖書館也是經歷过这段过程的。至1923年、1924年时，它已成为国内极有影响的圖書館了。1923年，藏書数增至598种，1925年3月圖書館藏書增至1106种，1926年7月圖書增至1825种2342部，期刊彙訂本56种320部，期刊散訂本62种923部。1928年，經過七年努力的上海通信圖書館，基本會員增至450人，讀者增至5000多人，圖書增至五千多种，在国内圖書館界起着巨大的作用。

圖書館的圖書借出数也是逐年俱增的，如1923年6—12月共借出書籍1663种，每月平均230多种。但在1924年10月份就增至448种，1925年8月达到662种，12月达755种。借書者遍及全国二十省区、各大城市、乡村更及于南洋羣島、日本、美国、法兰西等海外各地。

上海通信圖書館对讀者巨大的影响，我們可以从讀者的反映中看出来，一个署名“豫”的讀者是这样写的：“上通图共进会（上海通信圖書館共进会的简称——引者）是我們国家社会极有利益的团体，全国穷苦的青年、思想上、智識上受她的帮助实在极大，即就我个人而論，虽和她相識仅半年之久，但从她得到的恩惠利益，已經是不可計算的了。”“你們（指上海通信圖書館的工作同志們——引者）大无我的精神，利他的热忱，我真佩服，真景仰。不料在此拜金的社会里，竟使我充分的得到了人类真切篤摯的爱，实在是我梦想不到的事了！”从这些反映中，我們就可看到讀者是如何愛戴这个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提高思想觉悟，走上革命道路的圖書館了。

我們从所接触的一些資料中，也可以看到許多革命先烈和現代革命作家和文化界人士都在上海通信圖書館里做过事，实际从事过圖書館各項工作。在那里，他們受到了革命書籍的教育，接受革命斗争的鍛炼，走上了为謀求人类解放的道路。如惲代英同志就曾担任該館共进会执行委員中的監察委員，如从圖書館成立后就具体負責圖書館工作达六年之久的应修人同志，就是中共黨員，1927年曾赴苏联学习，在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傳部长时，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再如郭沫若、錢俊瑞、叶紹鈞等同志均在圖書館做过事或是一个忠实的讀者。而已故作家郑振鐸、郁达夫、……也是当时圖書館的同志。

党通过上海通信图书馆，通过革命斗争，培养教育了一批新文化革命中的坚强战士，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领导者。他们也为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开辟了道路。

火花迸发的动摇的革命的大时代，这大时代的浪潮中，卷去了我们好多同志，……

——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 1928年

大革命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中国社会，革命者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死斗争中，高举着红旗前进。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同志们，面对这一伟大的斗争，积极的投入了革命的行列，1928年9月，“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扉语中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次大革命风暴：“在去年三月国民革命军进展到上海，这是个火花迸发的动摇的革命的大时代，这大时代的浪潮中卷去了我们好多同志。同时，我们的‘通图’也不得不停顿下来，六月间，虽然有少许同志为它奔走，但是为革命所疲惫麻木陷于绝望衰颓的消沉啊！叫喊终于成为空响了。”这时，国民党当局早已蓄谋封闭它。先借接受、救济图书馆为名，以达到扼杀这革命图书馆的目的。（给每所图书馆六十元经费，而买书费只及二十分之一，这数字的可怜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国民党的卑鄙，只能引起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同志们及广大读者的极大愤怒，留在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同志积极奔走，团结读者，终于又把上海通信图书馆“复活”了，当然，这时的借书者仅及百余人，但仍然迅速的发展和壮大队伍，1928年3-9月，累计借书数又由115种115部增至674种3083部。她仍然在上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国民党见“接受”“救济”无效，1929年5月，摆出了屠杀者的面孔，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开出面，伪上海市教育局、公安局配合军警特务查封了“上海通信图书馆”。当时扣去图书馆执行委员二人，值夜委员二人，把全部图书、设备以至图书馆印章也没收了。

然而，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革命的火花也永远不会熄灭的，党有计划的把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同志们转入地下，而在一九三三年又在上海创办了“蚂蚁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继承了“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革命传统，在新文化战线上仍然以革命的姿态出现，吸引着广大读者。

国民党当局查封了上海通信图书馆后，把图书馆藏书严格审查了几个月，剩下几千册书并补充了大批反动、黄色书刊，安排了国民党特务，办起了“上海市流通图书馆”，想以反动思想麻醉和欺骗人民，但这个图书馆的读者是寥寥无几，而其读者成分是什么人也是可想而知的。鲁迅先生曾经描写过这时的中国文艺界，谓：“……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一方面，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驱使的自己的伙。但这立即失败了。因为里面满是走狗，这书店便象一座威严的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沒有人去，喜欢去跑的还是几只闲逛的走狗。这样子，又怎能使得门市热闹呢？……”（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 鲁迅选集 下卷 153 页 1959 人民文学）用这段话来形容国民党衙门——上海市流通图书馆，真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 × × ×

革命先驱者的鲜血，洒满了中国革命的漫长道路上，她们的工作，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同志们，为图书馆工作奠定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他们坚决贯彻党的领导，紧密配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第一次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喊出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它真正成为广大进步青年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承担着革命的重担，这种社会主义图书馆的党性，阶级性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光辉传统，是我们永远要继承

的。而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同志们，历尽艰苦，和反动派作不调和的斗争，千方百计，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广大读者准备精神粮食，这种一切为了读者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发扬的。扩大图书影响，对读者阅读作高质量的辅导，使读者读书后能真正受到阶级教育，革命教育的效果，这种社会主义图书馆工作方法，以及依靠群众，在群众中生根，在群众中发展，一刻不离开群众的革命方法，一样是值得我們学习并加以发扬的。

纪念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史的先烈们与先行者，正是为了继承他们的革命传统和战斗精神，为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创造出更优良的成绩。

作者附言：这是为了缅怀革命图书馆工作者而写的一篇资料性文章，感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其中可能有与事实不符者，望读者多多指正。写这篇文章时用的主要参考资料是“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应修人 潘漠华选集”（1957年 人民文学）中的几篇文章。